

從慎之先生遊

• 閔家胤

終於要寫一點東西來懷念李慎之先生了。自從先生離開我們之後，我一直有負債感，這種感覺多次撞擊我的胸膛，但一次又一次都被我壓回去了。2013年4月22日是先生十年祭日，我再也無法壓抑自己不敲鍵盤寫一篇文章了。

題目我不能用「回憶李慎之先生」，因為我們不是平輩，我也不是他的屬下；既沒同過學，又沒共過事，我有甚麼資格這麼寫？想來想去，我只不過是由於幾個偶然的機緣，作為晚輩，受到先生的眷顧，聽到先生的談吐，進入過先生的思想，隨先生在學界遊走過幾次而已，所以用「從慎之先生遊」最恰當——一個「人」在前面走，另一個「人」在後面跟着。

我同先生的見面，回想起來，應當是三十幾年前的一天，我偶爾因為甚麼事走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剛落成的十五層大樓第二層的西頭，驀然看見一位穿一身白色西裝的領導從辦公室踱步出來要下樓。當時眼一亮，心一驚，心想院部怎麼會有這麼一位異樣的領導，分明是五四時代人，或

1930年代人。我這一驚一楞使他扭頭朝我看了一眼，而我也同他對視了一秒鐘。我看出他頸部略長，向前探，黑邊眼鏡，鏡片一圈一圈，高度近視，顯然是一位飽學之士。

1989年「六四」之後，我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邀於1990年春參加「多種文化的星球」項目，負責撰寫「漢字文化圈」報告，要到巴黎赴會，於是到社科院二層外事局西歐處辦手續。處長告訴我：「你赴法國批准了。李慎之副院長批的。他要你拿了批件後到他辦公室去一趟，他對你這個項目有興趣。」我拿着批件出來，朝二層西頭走去，進到他辦公室。他從辦公桌後抬起頭來，我心裏又一驚：這不就是那位身穿白西裝、略長的頸部向前探、眼鏡片一圈又一圈的那位領導嗎！

在我向他匯報過這個項目而他表達了興趣所在之後，他說：「你從巴黎回來之後，再到我這兒來一次，講講詳細情況。」我問：「到哪兒？還到這間辦公室來嗎？」他說：「不要到這兒來了，馬上我就要離開這裏了，這次可能是我批的最後一個外事項目。」

到我家去吧。」接着，他就把家庭地址和電話都寫給了我。我不解地問：「為甚麼？」他笑了一聲說：「我已經被解職了。看吧，這是剛送來的解職令。」

我吃驚地接過解職令一看：剛打印出來，深藍色油墨未乾，寒光熠熠，字裏行間似有刀光劍影在晃動：

1989年夏天，北京的學生運動起來了。李慎之說：「民氣可用，社科院要表態。」於是鼓動常務副院長丁偉志，一道起草了一份文件，說服院長和其他幾位副院長都在上面簽名，向中央施壓。大軍進城後，中央召集副部級以上幹部開會。李慎之說：「我不在刺刀下面做官」，並拒絕出席會議。鑒於在這場政治風暴中的惡劣表現，經院務會議和黨組研究，報請上級主管部門批准，從即日起，正式解除李慎之擔任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和黨組成員兩項職務。

這段話，我之所以敢打上引號，是因為我一輩子就一次看到過這樣的

文件。讀的時候又膽戰心驚，全神貫注，所以讀一遍內容就全記住了；可是，肯定不敢保證一字不差。看完後我不解地問：「您真說過『不在刺刀下面做官』啊？」他呵呵一笑，說：「你不知道啊？這是我李慎之的名言。美國之音不斷廣播，早已傳遍全球了！」神色流露真實豪情。

從巴黎回來之後，我如約到慎之先生家拜訪。他家住建國門外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七號樓，距我家住的永安西里甲一樓不過一箭之遙，這不是天作之緣嗎？我早知道七號、八號樓是文革前蓋的，四層板樓，高級住宅，可從來沒進入過。這次進去發現果然高級，慎之先生的四居室全是水磨石地面。

聽完我的匯報，他問起我的經歷和研究工作。當知道我的研究方向是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的哲學問題後，他詳細詢問這些學科的內容，還要我找些書給他看。過了一段時間，我把自己寫完的一篇論文〈系統科學興起的哲學意義〉呈請指教，他看完



李慎之

後表現出極大興趣，主動要拿去讓人打印。我這才知道，原來他同于光遠、龔育之等幾位搞了一個課題，從設在國際俱樂部小樓裏的福特基金會駐華辦事處申請到課題費，在賽特大廈設有研究室，有專職文祕人員。又過了一段時間，我的論文〈廣義進化論的基本原理〉也被拿去打印出來了。令人感動的是，慎之先生對每篇打印稿都親自對着我的手稿校對，一個字一個標點都不放過。我的兩篇文章就這樣提前公諸同好了。

慎之先生賦閒之後，從1990年代初起，不多不少，每年都寫兩三篇文章，也只寫兩三篇文章。這些文章當時都沒有公開發表，只是以少量打印稿形式散發；可是，全都在京城不脛而走，迴響士林，並令作者成了無冕王者。有幸，鄙人應當是最早的讀者之一，現在，在一個專門的牛皮紙口袋裏，還保存有十篇。

先生給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寫於1992年6月的〈守死善道 強哉矯——讀《吳宓與陳寅恪》〉。所讀之書是吳宓



〈守死善道 強哉矯——讀《吳宓與陳寅恪》〉打印稿

先生的女公子吳學昭編的，按慎之先生的說法，此書的「真正作者是吳宓，而書中的主角則是陳寅恪」。內容是女公子從先父遺留日記和書信中整理出來的，從1919年哈佛初識到1969年雙目失明的陳先生因拒絕批孔被整死在中山大學和同樣是雙目失明的吳先生1978年戴着「現行反革命」帽子慘死家鄉農村，這五十年兩位先人斷斷續續的詩文往還和生死神交。

全文七頁，而我剛讀第一頁就被先生精煉老到典雅的文字折服，哀嘆文化斷層後無國學童子功之我輩可憐；繼而驚羨先生有福氣曾於1944年在成都燕京大學選學過陳先生的課，又同吳先生在成都縣何公廟的宿舍中同吃同住過。讀畢全文，我腦袋裏立刻浮現出「文章憎命達」這句杜詩和「厄而作春秋」這句太史公遺言。

此文，慎之先生飽含深情在寫陳寅恪和吳宓，寫真正的知識份子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命運，而實在又有夫子自道的蘊意。同樣是遭逢亂世而受制於暴政，同樣是堅持自身價值和人格追求，同樣是威武不屈和寧折不彎，慎之先生撰寫此文實在是在引陳先生和吳先生為同儕，反思和再肯定自己的選擇，進而宣示吾輩要「守死善道，強哉矯」；如此，中國傳統文化聖人氣象、大丈夫精神和君子儒人格方不致完全熄滅了香火。

慎之先生給我讀的第二篇文章是寫於同年的〈紀念馮友蘭先生〉。此文的開頭是回憶自己同馮友蘭曾經見過一面，那是1956年慎之先生隨周總理訪印，恰值馮先生在印度參加一個國際會議。繼而慎之先生回憶自己一生四次學習和鑽研哲學，而每一次都同馮先生和馮先生的書有關。他認為，在中國要研究哲學是繞不過馮友蘭的。



〈紀念馮友蘭先生〉打印稿

慎之先生感謝馮先生給了他「哲學上的第二次啟蒙」，使他從米丁 (Mark B. Mitin) 等的《新哲學大綱》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之類的書中走出來，回到中國哲學這個精神家園，又說：「我在遵照馮先生的指點，閉門造車的結果卻得出了許多與馮先生不同的結論。」

「首先，馮先生以證明『理世界』的存在作為其哲學體系的基礎，而我卻無論怎樣也無法想像這麼一個理世界的存在。」慎之先生接下來寫道：「我甚至不能同意馮先生所謂『一般與特殊的問題乃是中國哲學的根本問題』的說法。我以為中國哲學的主流正脈是宇宙論與之貫通的心性論，而不是馮先生以西方邏輯方法推出來的那種本體論。」慎之先生極度讚賞張載的「為天地立心」和馮友蘭提倡的「天地境界」。在文章的結尾處，他寫道：「為了個人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我們有義務繼承馮先生的遺志，開發中國哲學的寶庫」，並寄希望於中國出現「最哲學的哲學」和「最科學的哲學」。他還多次對我講，中國的問題

還是要從文化特別是哲學層次解決，自己要寫一本哲學書把這點講清楚；字數不用多，頂多十萬字。可惜先生未實現這一宿願就走了。

慎之先生雖然是被解職了，可是還享受副部級離休幹部的待遇，打電話就可以要車。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曾多次遵命搭乘他的車一同到京城某些地方出席學界民辦的小型研討會，跟着聽會和發言。

難忘的是他曾幫助我出版了一本書，那是匈牙利學者拉茲洛 (Ervin László) 1992年完成的一份新的羅馬俱樂部報告《決定命運的選擇：21世紀的生存抉擇》(The Destiny Choice: Survival Op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我組織人翻譯出來了，可當時出版業極為局促，我們面臨出版難，稿子在我手上壓下兩三年了。慎之先生知道後，立即要輛車拉着我到東單北邊一條胡同裏找沈昌文先生。當時，三聯書店剛從人民出版社分出來，正偏安在一座四層居民樓的半地下室裏。就這樣，該書得以在1997年出版，此事在那本書的後記裏也有記載。

還有一件不會忘記的事，慎之先生曾主動寫信，推薦我到普林斯頓大學深造，申請洛克菲勒獎學金。此事雖未果，可他用的機械打字機一個字母一個字母敲打出來的整整四頁英文推薦信，今天拿出來重讀一遍，那拳拳的心，依然令我感動。順便說一下，他的英文寫得非常漂亮和規範，不愧是新華社國際部的副主任和社科院美國所所長。

回想他對我的多次談話，還有甚麼很有價值而值得記錄下來的內容呢？

有一次慎之先生跟我談起毛澤東。他滿腔激憤地說：「毛在〈介紹一個合作社〉這篇文章中講，中國是

『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他這段話是大錯特錯了，中國恰恰是世界上最不白的那張紙，最黑最髒的那張紙。」細想，慎之先生說得對呀！中國五千年文化傳統，李澤厚稱是「積澱」，柏楊說是「醬缸」；至今中國還是死人拉着活人，傳統阻礙着現代，哪來一張白紙？倘若建國之初美國的華盛頓說「北美新大陸是一張白紙」，那還差不多。

一次，在先生家中談起鄧小平。慎之先生突然冒出一句：「唉，那時候他也很難……」然後沉默良久。我意會「那時候」是指1989年夏天。轉話題，我問他：「現在鄧小平在黨和國家沒有任何高級職位，還在掌權嗎？」他回答說：「鄧現在的權力比任何時候都大，說把誰拿下立刻就能拿下。」停了一刻，他又說：「鄧小平搞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他應當繼續搞『中國特色的多黨議會民主制』。」

還有一次，搭先生的車外出，在建國門立交橋上轉的時候，慎之先生指着我們院的大樓說：「這座樓是1978年鄧小平親自批一個億蓋起來的，同時下令把學部提升為社會科學院，立刻建研究生院，招你們『黃埔一期』四百人進來。那時他認為，自己搞改革開放，要同四人幫那夥人辯論十年，可是自己沒有理論陣地，兩報一刊全在人家手裏頭。」停了一會兒，他說：「可是後來鄧發明了『不辯論』，搞特區，讓事實來說話。」

慎之先生對他那屆院領導是頗為得意的，多次講：「我們那屆個個是專家一學者，不像後來。你看，胡繩是黨史專家，丁偉志是歷史學家，劉國光是經濟學家，汝信是美學家，錢

鍾書更是學問大家。」當然，我們現在還應當補充說：「李慎之是國際問題專家。」話說回來，慎之先生目光犀利，見解高明，心直口快，對個別同事也有不甚了了的評論，譬如他曾說：「跟胡喬木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才真正懂得甚麼是『膽小如鼠』。」還說過：「汝信是模範中學生。」

不過，慎之先生對錢鍾書先生的學問是真心佩服，多次讚美；並曾主持編輯打印《錢鍾書先生翻譯舉隅》一冊（總計八十一頁，我有幸獲贈，現在還保留一本），親撰〈編者前言〉曰：

錢鍾書先生當代碩學，其博學多聞，覃思妙慮，並世罕儔。世人咸知先生通多國文字，顧先生鮮有譯作，唯於著述中援引外國專家之語類多附註原文，學者於此得所取則。唯零金碎玉檢索不易，爰特搜集成冊，以便觀覽。後生末學得窺雲中之鱗，證月印於千江，則此帙之輯為不虛矣。

吾國民諺言：「同行必妒。」三國曹丕《典論·論文》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慎之先生對錢先生的譯文由衷讚美，投入精力輯錄成冊以嘉惠後學，實為我們開啟文人相重和同行互敬的新風。這種高尚的學風太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了。

談起翻譯，慎之先生何嘗不是大家？他原來是新華社國際部的副主任，分工管高幹閱讀的《參考資料》（「大參考」）和一般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小報。他曾多次對我說，許多從國外傳入中國的新詞，都是他敲定的漢譯。那時「大參考」的文字量比現在多五六倍，一天要出三本，上午版64頁，中午版24頁，晚上版32頁。這

樣，「一日三參」，每天都有二十三四萬字，量很大。請你想想他每天要經手和過目多少譯文！再請你想想，他怎麼不累得脖子前傾和高度近視！並且，在我從慎之先生遊的十多年間，他一直苦於頭痛病，除精神壓抑外，我猜他一定有很重的頸椎病。在心身雙重的痛苦中，他還為我們留下幾十篇肯定會傳世的很冷靜的文章，也真算是「春蠶到死絲方盡」了。

此外，慎之先生還曾經對我說：「中國知識界翻譯出版的書籍，二十世紀最初幾十年多是硬譯，質量很糟。改革開放這二十年多是快譯，質量很糙。惟有文革前後那三十年，知識份子受壓，踏踏實實慢譯，質量上乘。」這話對現在英文學習得不錯又在做筆譯的中青年，真正是良師益友留下的警策。

慎之先生為我做的最後一件事是替我的哲學專著《進化的多元論——系統哲學的新體系》寫了一篇序言。此前先生就有為我的書作序的意思，所以在1994年我為評研究員的需要撰寫這部書的初稿並請出版社排印出清樣後，當晚就登門請先生作序。由於一兩天後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就要開會了，所以留給先生作序的時間實在是太短了。讀這篇序言的人，都不難發現它是「急就章」；即使是這樣，慎之先生還是鉤玄提要地點出了此書的意義。他寫道：

系統哲學明確地預示着人們久已盼望的「科學的哲學」的出現。……與當代系統論相結合的廣義進化論完全與中國哲學的主流正脈——宇宙論與心性論相合拍。……本世紀下半期出現的系統哲學盡量包羅了當代科學的成果，對從宇宙的生成與人的認知能力

的出現作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包容廣大而又圓通周全的解釋。它已經有可能溝通分家已久的科學與哲學，溝通宇宙論與本體論，溝通自然與心靈，直到溝通唯物論與唯心論。這是一種最有希望的哲學。它有可能超越長期以來哲學家玄思冥想所發展出來的各種概念與術語而達到一個「最哲學的哲學」。

這些話是肯定，是鼓勵，也是鞭策。我非特銘記在心，更夙興夜寐，殫精竭慮；黽勉從事，克盡餘生來完成這樣一種哲學，以期不負先生的厚望。

以後的幾年，由於種種原因，我登門求教和隨先生悠遊學界的次數少了。2001年我從國外做訪問學者歸來，聽說慎之先生在同仁醫院的高幹病房住院治療，就買了鮮花、水果到醫院新大樓的頂層探望；當時，先生的氣色和言談均無異樣，萬萬沒有想到這一面竟成永訣；待先生突然辭世的消息傳到我耳朵時，因永安西里拆遷，我搬到回龍觀居住已有年矣。由於以前的電話號碼全廢了，是以沒接到參加追悼會或給慎之先生編文集之類的任何通知。

從此我心中就埋下了負債感，直到現在。在慎之先生辭世十周年的祭日，我提前找出保存先生贈我文稿的牛皮紙口袋，將十幾篇遺稿重讀一遍，撫今思昔，感慨良多，遂寫出一篇懷念文字，總算償還了深深埋藏在胸膛的心債。

願先生在天之靈有知，阿門。

閔家胤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